

## 第六章 相关问题的讨论

本章主要讨论两汉晚期卷棚顶的出现、有关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以及三国时期钵生莲花器与佛教海路传入的关系等。

### 第一节 西汉晚期卷棚顶的出现

中国建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因各地的气候、人文、地质等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其屋顶形式更是丰富多样。然而，由于风雨剥蚀、自然垮塌以及各种人为因素，许多古代建筑已不复存在，加之记载阙如，这些消失了的建筑，从布局到细部、从形式到结构的相关内容，很多难以考证。考古出土的较为完整的建筑明器，则多能弥补其中的缺憾。它以直观形象的表现方法，使我们得以研究古代建筑的形式和技术，管窥当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失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进入汉代，以仓、灶、井等模型明器为主要组合的随葬品成为汉墓最主要特征。屋顶式样已经发展成熟，出现了后代建筑比较常用的庀殿、歇山、悬山、囤顶和攒尖五种基本类型，“中国屋顶式样有四阿（清称庀殿）、九脊（清称歇山）、不厦两头（清称悬山）、硬山和攒尖五种，汉代五种均已备矣”<sup>[1]</sup>。刘敦桢先生以“囤顶”取代“硬山”，认为“到汉代已有庀殿、歇山、悬山、囤顶、攒尖五种基本形体和重檐屋顶”<sup>[2]</sup>。不过，遍观这些汉代的屋顶形式，在之前合浦汉墓出土中，尽管模型明器的数量巨大，但仓和屋的顶部形式则不多，发现几乎全为悬山，仅有极少部分为庀殿或攒尖。

分属西汉晚期和东汉晚期的合浦电厂 M1 和庞屋队 M1 出土的卷棚顶陶仓(11HDM1:1、13HZPM1: 扰 3)，是新出现的屋顶形式。卷棚顶是我国古代屋顶的形式之一，有悬山卷棚顶和歇山卷棚顶两种，其建筑为前后两坡不做大脊，瓦垄直接卷过屋面。屋面上的两条垂脊随瓦垄卷过屋面，呈罗锅状<sup>[3]</sup>。卷顶棚形式活泼美观，一般用于园林的亭台、廊榭及小型建筑上。至于卷棚顶最早出现的时间，论著基本没有涉及<sup>[4]</sup>，或仅举近代实例，如梁思成先生仅介绍圆明园，“屋顶形状仅安佑殿大殿为四阿顶，其余九脊顶，排山，硬山或作卷棚式”<sup>[5]</sup>。也有学者把辽宁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sup>[6]</sup>出土的陶屋，定为“硬山卷棚式”<sup>[7]</sup>，事实上，如报告所言，属悬山顶建筑。这件陶屋的屋面弧形，略同卷棚，但从其上的三个山字形脊饰来看，是有正脊的，不应算作卷棚顶。

合浦电厂 M1 的卷棚顶陶仓，平面作长方形，仓体正面开门，门两侧各有一加栓之用的扁圆突，前有走廊底板，仓底附四柱足，除屋顶外，与同时期的陶仓并无二样。延至东汉晚期，从庞屋队 M1 出土的陶濶可以看出，卷棚顶弧度变小，拱背略低，坡面上刻划有粗疏的瓦垄，且两侧带垂脊以加固。除此，其整体结构及外墙刻划梁架等，与同时期的陶濶也大致相同。尽管如此，这两件器物填补了目前国内汉代考古发现的空白，且年代确凿，把卷棚顶出现的时间上溯并明确在两汉晚期，这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意义重大。

### 第二节 有关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

有关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有下一段涉及航线、航程和贸易商品等内容的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糴而往。所至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国，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景祐、殿本作“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sup>[8]</sup>

这里输入的“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综合文献、考古发现与科技研究，我们认为主要有珍珠、玻璃、石榴子石、琥珀、水晶、绿柱石、玛瑙、蚀刻石髓珠、金花球、焊珠金箔等珠饰。一些零星出土的舶来器物，如波斯陶壶、铜钹等，为随身携带使用，不属于贸易商品<sup>[9]</sup>。在本次发掘中，尽管多数墓葬在历史上已被盗掘，但还是有不少相关的重要发现。

### 1. 玻璃

除西汉晚期汽齿厂 M7 出土 1 枚小巧的龟形饰外，其余均为串珠。串珠在三国墓发现 96 颗，晋墓发现 27 颗，其余绝大部分出自汉墓。汉墓出土的串珠共约 6043 颗，分出自西汉晚期的 6 座墓葬和东汉的 8 座墓葬，其中西汉晚期墓约有 3738 颗，出土数量最多的是汽齿厂 M7，约达 3000 颗；东汉墓约有 2305 颗，出土数量最多的是二炮厂 M8 出土，达 2131 颗。这些玻璃珠均为拉制珠，穿孔，扁圆或长圆形，有深蓝色、蓝色、浅蓝色、浅绿色、深绿色和铜红色等颜色。

我们选取有代表性的 25 份玻璃样品，送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检测分析，结果显示，有低钙型钾玻璃、泡碱型钠钙玻璃、混合碱玻璃、中等钙铝型钾玻璃等四种成分体系（详见附录一）。广西和越南北部是低钙型钾玻璃（m-K-Al）和部分中等钙铝型钾玻璃（m-K-Ca-Al）亚类的产地之一，这部分玻璃珠大都属于交州本地自制；混合碱玻璃在印度和东南亚都有较多发现，尽管确切产地尚不明确，但应该来自这些地区；泡碱型钠钙玻璃，则属西方典型的罗马玻璃。

### 2. 琥珀

出自两汉晚期的 3 座墓葬。二炮厂 M4 出土扁圆形琥珀珠 2 颗、鸽形饰 1 枚，二炮厂 M12 出土半圆形琥珀珠 1 颗，汽齿厂 M7 出土珽形饰 1 枚。

两广沿海出土的琥珀制品，以合浦最多、最集中，据不完全统计，合浦有 30 多座汉墓出土。关于琥珀，《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昌哀牢夷（今云南西部）出产琥珀。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也提到，注犍国（今印度南部）有“杂色琥珀”。从云南的考古发现来看，在石寨山和李家山汉墓中，很少琥珀出土<sup>[10]</sup>，因此，合浦出土的琥珀来自云南的可能性很小。“汉晋时期，极有可能，中国境内的琥珀尚未得到成规模的开采。”<sup>[11]</sup>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很早就把琥珀作为贸易商品，且非常昂贵。合浦发现的多件圆雕狮子，其艺术创作的母题也来自域外。狮子并非中国固有，汉代进入中国之前，其分布区沿地中海南岸，延伸至伊朗高原和印度西部，最北可达阿富汗。至于合浦汉墓中曾出土的刻汉字琥珀印章，或为进口原材料加工。因此，合浦出土的琥珀制品或原材料从盛产琥珀的缅甸等地海路输入的可能性很大。

### 3. 石榴子石

仅见于东汉晚期的一组串饰中（二炮厂 M14a 出土），共 32 颗，为红褐色，圆形或扁圆形。石榴子石珠是输入的另一类典型器物。石榴子石在大自然中分布广泛，斯里兰卡、印度、马达加斯加、美国、中国等国是石榴子石的主要产地，但在汉代及更早时期，印度、斯里兰卡是石榴子石加工的一个重要地区。合浦汉墓出土石榴子石串饰数量不少，形状多样，年代早至西汉晚期。合浦氮肥厂 M1 所出为系领状，合浦凸鬼岭齿轮厂 M6 所出为狮形，凤门岭麻纺厂 M4 所出为双锥形、圆形和系领珠，这种器形的玻璃珠和矿石珠（包括石榴子石）在印度阿里卡梅度遗址都有发现<sup>[12]</sup>，它们应是通过海路从印度、斯里兰卡一带传入的。

### 4. 玛瑙

两汉晚期的二炮厂 M4、汽齿厂 M7 和东汉晚期二炮厂 M14a 有出土，其中保存完整的二炮厂 M4 出土较多，共 7 颗。有橘红和橘黄两种颜色，圆榄形、珙形、系领形、圆形等形状。此前，合浦汉墓出土玛瑙还有做成圆珠形或动物形的串饰、扁圆坠、耳珙、剑扣、戒指等，颜色多为橘红，偶见黑褐和浅灰。

《三围志·魏志》等文献亦谓大秦国土产红玛瑙，今柬埔寨拜林地区也出产玛瑙。现今玛瑙产地分布广泛，不过，我国古代见于史籍的产地并不多，所以往往把珍珠、玛瑙等并列为“珠宝”，可见在汉代其来源并不广。许多地区的战国、秦汉墓中都发现有玛瑙，但以港口城市的广州和合浦等地的汉墓中发现最多，这应该说与海上交通贸易有密切的关系。

### 5. 蚀刻石髓珠

两汉晚期的二炮厂 M4 和 M12 各出 2 枚，圆榄形，有纵穿孔。M4 所出其中 1 枚两端偏蚀刻成乳白色，另 1 枚中部大块露白。二炮厂 M12 所出蚀刻位置都在中部，为条状或带状，蚀刻浅的部分，可以看到露出条纹下的红色玛瑙层。

合浦汉墓发现的蚀刻石髓珠，主要为在红、黑色的玉髓基体上蚀刻白色条纹。从石髓蚀刻珠的发展历史看，在其早期和中期阶段，印度都是主要的生产地。这种珠饰的制作复杂，从石髓和蚀刻碱料的选择以及加工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需要有长期的实践来摸索，传播多是家族继承式。但随着印度工匠的移动，蚀刻石髓珠的技术可能随玻璃技术一起传播到东南亚。合浦出土的器物，应来自南亚或东南亚地区。

### 6. 水晶

均出自西汉晚期墓。共发现白色透明水晶 4 颗，其中，二炮厂 M4 的 1 颗为圆榄形，二炮厂 M12 出土 1 颗为六面榄形，汽齿厂 M7 出土 1 颗为圆形，另 1 颗破碎。

合浦发现的水晶有无色和紫色两种，以无色居多，形状有管柱形、圆形、多面体等，无色水晶的透明度很高。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是紫水晶的主要产地，也是宝石加工的中心，其东部孟加拉湾沿岸的阿里卡梅度遗址也出土大量水晶、紫水晶、玛瑙、缟丝玛瑙、石榴子石等半宝石加工而成的珠子<sup>[13]</sup>。紫水晶应来自一带，而白水晶在本地也无可资开采的矿源，一同输入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这批汉墓还出土熏炉 15 件，其中西汉晚期墓中有陶熏炉 1 件、铜熏炉 3 件，东汉墓中有陶熏炉 10 件、铜熏炉 1 件。熏炉在合浦汉墓中较常见，已出土达 54 件，其中陶质 33 件，铜质

21件,一般为每墓1件,望牛岭M1号和凤门岭M26等大中型墓葬则出土2件铜熏炉,而出土波斯陶壶等的寮尾14B号墓,虽已被盗,但出土最多,有2件陶熏炉和1件铜熏炉。从年代看,铜熏炉的出现时间较早,西汉中期后段的凤门岭M27已有发现,其他多集中在西汉晚期。凤门岭M24B出土的陶熏炉,内存炭条;堂排M2B的铜熏炉,“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sup>[14]</sup>。据韩槐准《龙脑香料考》考证,汉时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以及波斯都盛产龙脑香,可能已辗转输入中国<sup>[15]</sup>。中原地区熏炉的出现相对晚一些,熏香的风气是自南往北逐步推广的,而高级香料最先是南海输入我国的<sup>[16]</sup>。按当时的交通贸易情况,岭南所需的香料应是来自东南亚各地,而熏炉的广泛出现,意味着香料在汉代合浦已是寻常之物。

### 第三节 三国钵生莲花器与佛教的海路传入

发掘于1972年的合浦凤门岭M1,是一座横直券顶合穹隆顶砖室墓,年代属东汉末期。2005年,笔者在广西博物馆库房看到该墓出土的残存器物,之后又查看原始发掘记录,觉得墓葬形制也独特,遂整理作2003~2005年凤门岭汉墓发掘报告的附录发表<sup>[17]</sup>。墓葬出土一件原登记为“陶柱顶座”、后报告中更名为“陶灯模型”的器物,通高65.6厘米,分座、把、盘和火焰四部分。灯座方形,上宽下窄,截面呈倒梯形;灯把作长方柱,上有方卯;灯盘宽大,敞口折沿,浅腹,中开方孔;火焰似花蕾,上部尖,中间大,底部作方形榫头通过盘中方孔,套入灯把上端的卯口。当时类似器物除合浦县博物馆的3件旧藏“莲花顶”外,还有1996年禁山七星堆M8出土的1件“莲花状器”<sup>[18]</sup>。之后,在2007年合浦中粮集团M8和2008年合浦还珠南路M1的发掘中再各发现1件,加上本报告的6件,已有13件之多。

随着发掘资料的增加,一些认识逐渐清晰。首先是器物的出现时间和分布比较明确。东汉末期开始出现,仅1件,其余12件均属三国时期,到晋、南朝墓已消失,说明仅盛行于三国一代,且目前的发现限于合浦一地;其次是器物的演变比较清晰。相较于东汉末期,三国墓出土的器物虽有部分灯盘缺失,但结构却基本一致。不过,变化却很明显,器物变低矮,仅24~30厘米,部分简化无底座,象征火焰部分的莲花,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一些如前期,仅有蕾,有些刻出了花瓣,还有一些作含苞欲放状,形象更为生动。

但是器物的定名问题,依然颇费周章。由于其他地区没有出土,且所出墓葬均已被盗,器物原来放置的准确位置不详。见诸于馆藏品和报告中的名称较为杂乱,部分可能可以排除,如“陶柱顶座”和“莲花顶”,是把器物作为墓室的建筑构件,但从完整的墓葬,特别是穹隆顶墓来观察,并无安置类似构件的位置。之前在凤门岭M1报告中考虑为灯具,是因为其具备灯的主要结构,比如说灯盘、灯把、灯座等,莲花状尖锥部分似火焰,但也隐约感觉不妥,主要是现存的莲花灯造型,莲花均为盛开,是作为灯盘用途的,而且在本次发掘的二炮厂M13中,除这件器物外,还伴出1件陶灯,虽形制不一,但一座墓同出两件陶灯,这在合浦发掘的完整汉墓中,也似未曾见。

受佛教“钵生莲花”的故事及何志国先生《钵生莲花镜考》一文<sup>[19]</sup>的启发,我们初步把这件器物定名为“钵生莲花器”。理由如次:其一,器物的主要特征吻合。上半部分莲花和钵的造型与钵生莲花镜相似,下半部分作为座足,便于安放和供奉。其二,器物的出现与研究者们认为佛教传入广西的年代相当。“佛教传入广西的时间,最晚不迟于东汉末年,最早当在西汉晚期。”<sup>[20]</sup>能做

佐证的是关于牟子的例子。苍梧广信（今广两梧州）人牟子，东汉末年避乱于交趾，交州一带佛教兴盛，后牟子返乡定居，潜心研究佛学，终成佛教经典著作《理惑论》。合浦毗邻交趾，又是广信通交趾的必经之路，无疑会受到佛教的直接影响，至晚到东汉末期，佛教在合浦当地已经形成气候。其三，合浦汉墓之前出土的其他相关文物，或说明这一时期佛教在当地的存 在。有学者把狮、象、鸽子等象征性的动物形象，堆塑器、塔式罐之类的象征性建筑造型以及“托钵僧”俑（或称“俑形灯”——笔者注）、胡人俑和佛像等，作为佛教文化从战国以后至东汉时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流行的艺术积淀<sup>[21]</sup>。这种说法或过于笼统抽象，部分文物也很难证实与佛教有直接关系，但合浦汉墓出土不少琥珀、玛瑙的狮子饰件，还有绿松石鸽子饰件等，确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相关，并不排除是佛教文化影响之下的产物。因此，在当时的文化交流背景下，出现钵生莲花器这类佛教文物，似也应在情理之中。钵生莲花器应是佛教通过海路传播的重要见证，有学者称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佛教传播之路”<sup>[22]</sup>，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钵生莲花镜上，可见对着钵生莲花下跪作揖的两人形象，如此看来，钵生莲花器也是一件供奉神器。器物出自 Aa 型 II 式、Ab 型 II 式及 B 型 II 式的砖室墓中，墓葬为分室或穹隆顶，规模相对较大，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应较高，反映出在东汉末期至三国时期，佛教已在合浦地区特别是在中上阶层扎根，并逐渐盛行，人们“一心向佛”，且通过随葬品的形式，延续到阴间。

吴景帝永安七年（264 年），东吴为便于治理，把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从交州划出，另设广州，合浦以南（含合浦）原骆越之地依旧属交州。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可能是钵生莲花器局限在合浦小范围的其中一个原因，而俑形灯在珠江流域的广州和广西梧州、贵县的汉墓多有出土，合浦则无发现，又反映出信仰观念和埋葬习俗方面的差异。

[1]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 63、299 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年。

[2]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第 14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年。

[3] 王效清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术语词典》第 264 页，文物出版社，2007 年。

[4] 李金龙在《中国古建筑屋顶析》（《戏剧艺术》1993 年第 6 期）一文中提到“据专家考证，卷棚顶最早起于南北朝”，但出处不详。

[5]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 63、299 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年。

[6] 辽宁省博物馆、辽阳博物馆：《辽宁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1985 年第 6 期。

[7] 周俊玲、高强：《从建筑明器看秦汉房屋的架构》，《文物世界》2012 年第 6 期。

[8]（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 1671 页，中华书局，1962 年。

[9] 相关论述可参见：Xiong Zhaoming, The Hepu Han tombs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Han dynasty, *Antiquity*, Vol:88, 342, pp. 1229-1243.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的钠钙玻璃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 年发掘报告》第 133~136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 年。

[10] 石寨山出土 1 串，李家山出土 16 枚。参见张增祺：《晋宁石寨山》第 104、214 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 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 221 页，文物出版社，2007 年。

[11] 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第 103 页，巴蜀书社，2007 年。

- [12] FRANCIS, P. Beadmaking at Arikamedu and beyond. *World Archaeology*, 1991, 23 (1):28-43.
- [13] Final report on Arikamedu, India. *The Margaretologist* Vol.13, No.2 Issue 30, 2001.
-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
- [15] 韩槐准:《龙脑香料考》,《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一辑第3~19页,1941年。
- [16]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图说》第358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附录一,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禁山七星岭东汉墓葬》,《考古》2004年第4期。M8的年代在报告中定为东汉后期,但从其出土包括莲花状器在内的陶器和高温釉陶器来看,与寮尾及本报告的三国墓一致。
- [19] 何志国:《钵生莲花镜考》,《民族艺术》2011年第2期。
- [20] 陈波江:《佛教传入广西时间考》,《学术论坛》1995年第5期。
- [21] 李刚:《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 [22] 李庆新:《唐代南海交通与佛教交流》,《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